

# 从陪伴缺位到媒介补位： 智能手机与农村留守儿童的 互动研究

包思雨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5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13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21日

## 摘 要

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留守儿童不仅面临着家庭结构变迁带来的社会化问题，他们的媒介使用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日常学习实践。基于本文田野调查发现，智能手机也在逐渐嵌入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本文以农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智能手机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家庭陪伴不足的情境下，智能手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媒介补位”的作用，不仅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新的情感表达渠道，也改变了其同伴交往方式，但过度依赖数字媒介亦可能带来网络依赖与社交封闭等风险。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数字媒介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并为农村基础教育中媒介素养培养与学生行为引导提供了经验依据。

## 关键词

留守儿童，智能手机，陪伴缺位，媒介补位

# From Absence of Parental Companionship to Media Substitution: An Interactive Study of Smartphones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Siyu Bao

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April 15, 2026; accepted: May 13, 2026; published: May 21, 2026

##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confronted not only with socialization issues arising from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but also with the influence of media use on their everyday learning practices. Based on fieldwork findings, this study observes that smartphon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the daily liv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aki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smartphones in their socialization proc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insufficient parental companionship, smartphones to some extent function as a form of “media substitution”, providing new channels fo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reshaping patterns of peer interaction. However, excessive reliance on digital media may also lead to risks such as internet dependency and social withdrawal. Understanding this process contributes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media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offers empirical insights for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and behavioral guidance in rural basic education.

## Key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Smartphones, Absence of Parental Companionship, Media Substitu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壁垒逐渐瓦解。城市建设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这也吸引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在这一人口流动的过程中, 由于受到经济水平、住房、社会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 部分农民工子女无法跟随父母进城, 只能跟随祖辈在农村生活, 从而使得留守儿童现象加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中的数据, 2022 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 1086.6 万人, 尽管农村留守儿童的总量有所下降, 但这个群体规模依然十分庞大, 面临的问题也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复杂性[1]。已有研究表明,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亲子分离、情感支持不足以及教育资源不均等多重问题, 其家庭结构和社会化环境与普通儿童存在明显差异[2]。并且在父母长期外出的情况下, 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主要依靠爷爷奶奶这样的隔代抚育模式, 这种家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教育与情感陪伴的功能, 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和情感缺失[3]。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 父母的外出务工以及实际抚养人的变化使得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 父母的缺位会影响其社会交往方式, 行为习惯与认知水平等方面的发展,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 也为留守儿童的成长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截至 2020 年 3 月, 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2.55 亿, 占到整体网民的 28.2% [4]。对这一代的留守儿童而言, 数字媒介已经不仅是娱乐工具, 更是他们获取信息、维系亲情、建立同伴关系以及构建自我身份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关研究指出, 在家庭陪伴不足的情境下, 智能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情感补偿与社会互动的功能, 一些学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数字代偿”, 即数字媒介在现实社会关系不足时对个体情感与互动需求的替代性满足[5]。此外, 社交媒体平台也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新的交往空间, 使其能够通过网络维系同伴关系或获得社会支持, 但这种交往局限于相对封闭的社交圈层, 可能进一步强化群体内部的信息循环与互动模式[6]。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界主要从心理健康、媒介使用方式以及网络成瘾等方面来探讨智能手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与其他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情感健康状态较差[7],留守儿童在情感上呈现出封闭和渴望相纠结的复杂状态[8],积极情感体验不充分、负面情感表达受阻、应急情感沟通不畅是其家庭情感生活的主要问题[9]。并且随着社交媒体的介入,家庭、同辈群体、学校等不同的社会化主体也呈现出新的特质[10]。网络媒介社交偏好能够显著提高留守儿童的理解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而和父母交流是农村留守儿童使用网络媒介的主要动机,网络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留守儿童家庭功能的缺失[11]。但与此同时,基于留守儿童非理性选择构筑而成的“社交茧房”往往扼杀了潜在的交往机会和交往关系,甚至由此进入另一种社交封闭之中,留守儿童在智能手机下的社会交往由此可能走向异化。高可馨等人的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普遍有网络成瘾倾向,而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通常表现出更严重的网络成瘾倾向[12],并且手机成瘾对女性留守儿童和寄宿留守儿童的负向影响也会更强。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影响或媒介使用效果,对于智能手机如何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发挥作用、如何具体嵌入其日常互动与社会关系之中,仍缺乏基于微观经验的深入讨论。

在当前基础教育体系中,农村留守儿童不仅面临家庭支持不足的问题,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挑战。一方面,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其学习与注意力分配方式发生变化,影响课堂参与与学习习惯;另一方面,学校在媒介素养教育与数字行为引导方面仍相对薄弱,难以及时回应其在数字环境中的发展需求。因此,将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问题纳入教育视野加以审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尝试从“陪伴缺位——媒介补位”的视角出发,探讨智能手机在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意义。

笔者将研究地点选取为郑州市X镇,并在此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一方面,该地区劳动力外流现象较为普遍,留守儿童具有一定规模,具备典型性;另一方面,当地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较高,为考察数字媒介嵌入儿童日常生活提供了现实基础。此外,研究者通过前期接触已建立初步田野关系,有助于获取更为真实和深入的一手资料。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本文聚焦于“留守儿童”这一核心群体,并将其界定为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半年以上)外出务工、由祖辈或其他亲属代为照料的未成年人。在此基础上,为增强研究的情境完整性,研究同时纳入部分非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作为参照对象,以便进行对比分析。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择样本。首先,根据“留守状态”“年龄阶段”以及“媒介使用频率”等标准筛选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其次,在访谈过程中通过受访者推荐其同伴或家庭成员,逐步扩展样本范围,以提升资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笔者采取了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两种方式。在田野点对儿童的日常生活进行跟踪观察,重点关注其手机使用情境、同伴互动方式以及家庭交流状况,并形成田野笔记。深度访谈的每次时长约30~60分钟,在取得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整理为文字资料。主要访谈的内容围绕父母外出情况、智能手机的使用状况、和同伴的线上线下互动情况等方面来展开。

最终,共访谈儿童30名,其中留守儿童16名,非留守儿童14名,并对其中部分儿童的祖辈监护人及外出务工父母进行了补充访谈。受访者年龄主要分布在7至15岁之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成长阶段儿童的媒介使用与社会互动特征。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首先,在访谈开展前,研究者已向受访者及其监护人说明研究目的、内容及使用方式,并取得知情同意;其次,在资料整理与呈现过程中,对所有受访者采用匿名处理,并隐去具体地名与可识别信息;为使受访者之间的亲属关系更加直观化,同一家庭的受访者将采用同一字母编号,字母后的数字“1”指代留守儿童,“2”指代祖辈,“3”指代亲代(如小鑫,编号A1;小鑫爷爷,编号A2;小鑫妈妈,编号A3)。最后,研究仅用于学术分析,不涉及任

何商业用途，以最大程度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与权益。

## 2. 留守家庭中的陪伴缺位

### 2.1. 父母外出务工与亲子陪伴缺位

鲍曼的《流动的生活》一书中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液态”的现代社会，而“流动的生活”，就是指在这种环境下，一种充满不确定性、不断变化、缺乏固定根基的生存状态[13]。而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是“流动的生活”在当代一个非常具象且深刻的体现之一。而人口的流动必然会导致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

有学者指出长期亲子分离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疏远，这种疏离会使得亲子之间缺乏亲密感，出现沟通障碍，不少这种情境下的儿童也会对父母感到冷漠或不满[14]。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亲子分离不仅使得亲子之间产生沟通障碍，甚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被抛弃感与自我怀疑，并且长期处于这种情绪下，大脑会持续分泌压力激素，进而让这些留守儿童产生焦虑抑郁的心理疾病[15]。在调查过程中，这种亲子陪伴的缺位也在许多家庭中有所体现。如受访者 B1 表示，自己平时主要通过微信视频与父母联系，但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时间仍是独自待在家中玩手机游戏。“父母不在家，只有爷爷奶奶管我”，B3 对这种情形也表示很无奈“我们平时工作很忙，有空闲下来了就会跟孩子打电话，但总是没什么话好说的，孩子对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淡了”。

在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的背景下，留守儿童在家庭生活中普遍面临陪伴不足的问题，亲子互动逐渐从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交流转变为以手机为媒介的间接联系，这也为后文讨论智能手机在家庭关系中的“媒介补位”提供了重要背景。

### 2.2. 隔代抚育与家庭教育功能弱化

而父母的外出工作也使得育儿责任将落在祖辈的身上，出现隔代抚育的现象，但留守家庭中的隔代抚养会出现许多弊端。不少留守儿童会出现和爷爷奶奶同处在一片屋檐下，却相视无言的状况，这种“身在心不在”会使得祖孙之间的关系逐渐的疏远且淡漠。在一方面，祖辈也会对外出务工的子女有所不满，认为他们没有承担起父母应尽的责任，这种不满也会让他们与孙辈互动时出现更多的无力和责罚。正如受访者 N2 所说：“他们在城里面管不着孩子，那我在家也管不住，孩子不听话，打一顿就老实了。”但这种教育方式也会更加地激化两代人之间的矛盾。N1 提到：“有事情我也不愿意跟他们讲，爷爷总是批评我不懂事，有时候还会打我，所以我在家里只会呆在自己的屋子里不出去。”

另一方面，处在文化水平低和数字鸿沟的背景下的老人，在儿童成长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有限的，并且祖辈的抚育大多仅停留在“吃饱穿暖”的层面，对于儿童的心理健康以及学业水平等方面的关注是很有限的。受访者 W1 说：“我每次跟爷爷奶奶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他们都只会让我好好学习，不要天天搞那些有的没的……慢慢地我就不说了。”受访者 Z1 也同样提到这种情况：“我感觉和奶奶说话很费劲，每次我和弟弟发生争执的时候，她都让我让着弟弟，说弟弟年龄小，有时候我也感觉他们对弟弟比对我更亲近。”这些祖孙间的互动在农村并不少见，许多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当儿童的情绪得不到及时的回应时，他们渐渐也会封闭自己的内心，使得家庭关系更加僵化。

因此，在父母外出务工和隔代抚育的双重背景下，留守儿童不仅面临着在家庭情感支持方面的不足，在学习指导与日常监管方面也缺少一个引路人的角色。与父母主导的家庭教育相比，祖辈更倾向于采取以“生活照料”为核心的抚育模式，在学习监督、行为规范引导以及情感沟通等方面相对薄弱。这种由“教育导向”向“照料导向”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功能。由此可见，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为智能手机进入儿童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使数字媒介逐渐成为填

补家庭陪伴空缺的重要工具。

### 3. 智能手机的媒介补位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媒介也成为了儿童社会化的又一个主体[16],既有研究表明,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社会支持不足与情感缺失时,往往会转向互联网以弥补心理需求,这一过程被概括为“补偿性互联网使用”[17]。在农村情境中,家庭支持的结构性缺位是青少年形成网络依赖的重要诱因[18]。与传统媒介相比,智能手机有娱乐、信息获取、社会交往等多种功能,帮助留守儿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父母不在身边所带来的空缺感。与此同时,媒介环境学派提出的“补偿性媒介理论”认为,新媒介的发展本质上是对既有媒介功能不足的弥补[19]。距离和媒介技术虽然会限制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亲密沟通,但是也为缔造更牢固的亲子关系提供了突破口。所以说,智能手机不仅成为留守儿童重要的娱乐工具,也在情感表达、同伴交往以及家庭联系等方面发挥着补偿性的作用。因此,从社会支持理论与媒介补偿逻辑出发,可以将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理解为一种嵌入社会结构中的“媒介补位”过程。

#### 3.1. 日常娱乐中的媒介陪伴

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儿童的娱乐活动大多都是群体性的户外活动,例如抓蝌蚪、捉迷藏、跳皮筋等等,这也为儿童群体之间的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但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乡村儿童的娱乐文化逐渐呈现出媒介化转向,手机游戏等线上娱乐逐渐成为其重要娱乐形式[20]。以地域性的集体活动为主的交往模式已经大规模减少,更多的是儿童独自在家中通过网络来进行的娱乐活动,儿童开始从“村庄公共生活”转向“手机私人空间”[21]。

在田野调查中,这种变化在许多儿童的生活中都有体现。C1 等待朋友时始终低头刷短视频。当研究者与其交谈时,他表示自己每天都会花较长时间观看短视频,“有时候一刷就停不下来”。在谈到平时的娱乐方式时,他表示:“以前还会和同学打球,现在很多时候就在家玩手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一名和奶奶一起生活的初二女生 H1 身上,她在访谈中提到,放学回家后通常会先写作业,然后通过手机看电视剧或刷短视频,“家里就我和奶奶,她看电视,我就在旁边玩手机。”

对于这些留守儿童而言,手机不仅是一种娱乐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陪伴”的角色。在家庭互动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数字娱乐内容为青少年提供了持续的情绪刺激和注意力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和无聊感。因此,在留守家庭情境中,手机逐渐成为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娱乐方式。

#### 3.2. 远程沟通中的情感联系

除了娱乐功能以外,智能手机也是留守家庭中维系家庭成员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能够跨越空间的限制,为远在他乡的亲人提供一个及时沟通的方式。有学者指出,各类网络沟通平台的使用确实有助于提高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频率,智能型移动电话中的行动通讯软件工具已成为孩子与父母等家庭成员进行日常沟通的不可或缺的工具[22]。在留守儿童家庭中,手机也在发挥出新的意义和实践策略。许多留守儿童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平板等智能设备,通常是外出的父母专门为他们所准备的。“我们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有个手机更好跟孩子联系。”(受访者 C3)有些家庭会害怕孩子沉浸于手机,于是通过祖辈的手机跟孩子进行联系。“给她买手机的话怕她老爱玩不学习,所以每次都是跟她奶奶的手机打电话。”(受访者 H3)

智能手机也可以实现一种“赛博陪伴”,有些父母得以弥补内心的亏欠感,以“媒介替身”的方式陪伴儿童成长[23]。受访者 D1 提到,“我和爸爸妈妈经常会三个人一起玩小程序里的斗地主,有时候爸爸

还会跟我一起玩吃鸡，一般都是我写完作业了才会陪我打游戏，这样我也玩得很放松。”

并且智能手机的出现，也为远程学习辅导提供可能性，在外务工的父母可以通过手机更方便快捷地参与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24]。“他们老师会在班级群发很多信息，现在学校会让家长辅助检查作业什么的，我就会让孩子写完作业给我拍照片，有时候我也会用手机搜题看看数学题和英语题的对错。”(受访者 N3)

由此可见，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确重构了留守儿童家庭的日常交往方式，智能手机的出现也成为了他们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并且智能手机也能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强大的社交网络，并将重构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方式。

## 4. 媒介补位下的互动重构

### 4.1. 同伴关系的线上重塑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儿童之间的交往主要是依靠地缘和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他们的社交圈子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学校之间，社交范围有限，一旦离开了学校的环境，儿童之间的联系就很容易地被切断了，因此留守儿童在同伴交往方面常常存在着劣势。但是智能手机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智能手机也在重塑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手机能够创造一种“共在”的空间感，即使双方处在物理空间上的分隔状态，但手机仍然能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分享情感、表达关怀，创造“移动的家园”[25]。这种联系也能为父母引导留守儿童的成长发展提供重要帮助。对于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外貌、性格等方面自卑而难以建立关系的人来说，互联网可能会为他们提供一个更为开放包容的空间，帮助他们去进行社交和表达自我[26]。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多名留守儿童都表示手机已经成为了他们与同伴交往的重要工具。通过即时通讯软件、网络游戏以及短视频平台等数字媒介，他们可以与班级同学在课后依旧保持联系。受访者 L1 谈到：“有时候白天在学校没说几句话，晚上一起打游戏的时候反而聊得更多。”在这种交往方式下，手机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维系同伴关系的重要手段。

与同学之间线上交流也能一定程度加深朋友圈之间的友谊。以往儿童之间的交流可能只局限于学校环境内，但是在智能手机的支持下，儿童能够在课余时间继续和同学进行沟通。“我们经常在班级群里面聊天，还会在班级群里面一起玩游戏，讨论作业。”(受访者 W1)据此我们可以得知，社交网络使得原本分散在不同空间中的儿童能够在虚拟的空间里重聚，并且形成一种更加持续的互动模式。

除了维持现有的线下关系外，社交媒体平台也可以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一种新的社交机会。“我在抖音上认识了几个女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因为我们都喜欢共同的明星，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久而久之就变成好朋友了，我们还加了微信，经常在微信上聊天。”(受访者 H1)相比于现实生活中固定的社交圈子，这种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网络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拓宽留守儿童的交往范围，并且给予他们许多情感层面的回馈与帮助。由此可见，智能手机就像是一个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引领留守儿童去探索更为广阔的天地，使原本仅仅依靠线下空间的社交方式得到拓展。

### 4.2. 数字空间中的情感表达

情感是家庭小单位里的一个独特的沟通方式，通过情感层面的陪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亲近与信任。有研究指出，家庭单元中的情感氛围是儿童间接进行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渠道[27]。然而在留守儿童家庭中，亲子之间的沟通方式往往带有很强的说教性或者“事务型沟通”受访者 G1 提到：“他们从来不会关心我有没有开心的事情，只会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或者吃了什么饭。”，但另一方面，这种聊天方式也往往与家长的自身经历有很强的关系，正如受访者 G3 的讲述：“我不多讲讲，他万一以后

跟我一样出来打工，日子过得这么难怎么办，所以每次打电话我都说好好学习是最重要的。”父母希望子女可以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但是由于空间的限制，亲子之间的沟通往往也只能停留在表层的联系。

但是随着数字互联网的发展，留守儿童作为新一代的“数字原住民”，他们每天的上网时间甚至比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更多，那么这种情形是否也会为留守儿童提供一种新的情感表达渠道呢？“有时候心情不好了我会发朋友圈，下面就会有同学来安慰我，但是和家人是不会这样聊天的。”(受访者 M1)在她看来，这种来自朋友的线上回应往往比现实中的沉默更能给人安慰，并且线上分享这种隐性的情感沟通方式也能使得儿童在不直接面对现实交流压力的情况下表达感受。

还有不少留守儿童会通过浏览各种短视频平台上的兴趣内容来缓解情绪。受访者 C1 平时喜欢在短视频平台看搞笑视频，并与网友一起评论互动。“有时候看到评论区的网友一起开玩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也会把自己觉得好玩的视频在抖音上分享给朋友，他们也都很喜欢跟我分享。”这种轻松的互动氛围，也成为了留守儿童调节心情的一个重要渠道。除此之外，网络游戏和亚文化圈层也能帮助留守儿童获取更多情绪价值，并且能够在特定的场景中有成就感和群体归属感。受访者 K1 喜欢玩游戏，“玩游戏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很厉害，而且有时候还会带朋友一起提高段位，游戏连胜的时候我还会发到朋友圈跟别人分享。”K1 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本研究采访的留守儿童中，男生经常用打游戏来消磨时间，并获得很高的自豪感，女生会更容易在看小说和追星的时候获得满足和快乐，每当和她们聊起喜欢的事情时总是滔滔不绝。

从情感社会化方面，智能手机可以为它们提供间接性和替代性补偿，这种“数字代偿”机制使虚拟情境下的情感社会化成为可能。智能手机提供了一个平台，在互联网上，留守儿童可以摒弃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让其不管是心理层面还是实践行为上都有一个全新的探索，为留守儿童带来了更加多元的情感互动方式，这也能为留守儿童家庭的原生性不足提供补偿。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空间中的情感表达虽然是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的新渠道，但这种互动往往伴随着碎片化的信息获取。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可以通过使用表情符号、GIF 动图或歌曲等方式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或情绪困扰，这种便利性可能会促进或阻碍用户的情绪表达，并更广泛地影响他们与朋友的关系[28]。

### 4.3. 媒介依赖与社会化风险

然而，随着手机以及互联网的入侵，留守儿童在网络中也会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虚拟世界。

智能手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留守儿童的社交和情感层面的空缺，但是同样数字媒介的过度依赖同样也会带来不少隐患。农村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其自身的媒介素养与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29]。在访谈过程中，W1 提到：“他们总拿收手机来威胁我写作业，但是没有手机的话，写完作业我又特别无聊不知道要干嘛。”与城市儿童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不同，农村留守儿童的娱乐活动十分有限，再加上父母不在身边，祖辈也很少能够给予留守儿童有效的陪伴和娱乐方式，所以手机也慢慢地成为了一个被严重依赖的工具。在隔代抚养的家庭结构中，祖辈往往受限于自身的文化水平与数字鸿沟，缺乏对孙辈进行有效数字化监管的能力，因此在隔代抚养下的留守儿童会有更严重的网络成瘾倾向。

从心理机制来看，留守儿童对于手机的依赖也和他们的情感满足状态有关，有研究指出，高感觉寻求的孩子会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追求新鲜感和刺激，很难维持一段稳定的有深度的人际关系，但这也会使他们有更强烈的孤独感，而孤独感又会使他们寻找替代性满足的方法，这将进一步加深他们手机成瘾的风险[30]。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不在身边以及和祖辈沟通的隔阂也会进一步加深他们的孤独感，进而转向网络世界中去寻求精神寄托。

然而智能手机虽然能为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提供一种新的方式，但是对于中小学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讲，他们自身抵抗诱惑的能力是不足的，沉迷其中也会使得留守儿童陷入社交茧房之中，他们的开放性

社交面临着向另类封闭空间转化的可能。智能手机看似一方面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交空间，但受算法推荐的影响，他们将越来越倾向于和自己兴趣圈内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互动，而不愿意与现实生活中异质性很强的朋友同学进行磨合。这种“社交茧房”也会严重地阻碍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进程。受访者 F2 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与无奈：“现在一放假，他能一天待在屋里不出来。吃饭都要叫好几遍，也不知道写作业，村里亲戚家的小孩来串门他也不理，就知道抱着手机盯着手机屏幕笑，整个人好像变傻了。”部分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较高频率的手机使用习惯，尤其是在短视频与游戏内容的持续吸引下，容易占用原本用于完成作业或课外学习的时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缩学习投入。此外，碎片化的信息接触方式，也可能对其注意力的持续性产生影响，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更易分心，难以保持长时间的专注状态。这种由于媒介依赖和“社交茧房”让原本应该在田野间自由奔跑的农村儿童却被困在屏幕之中，不仅会削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互动的能力，也将降低农村留守儿童的多维健康水平[31]。

##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农村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在父母外出务工和隔代抚育的背景下，分析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陪伴缺位与家庭教育弱化的困境。研究发现，随着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数字媒介不仅是儿童的娱乐工具，而是逐渐成为了连接农村留守儿童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桥梁。同时，这一过程也对其学习行为与日常教育情境产生潜在影响，呈现出数字媒介深度嵌入儿童发展过程的现实特征。

在家庭结构层面，父母的长期外出使得农村留守儿童长期处在陪伴缺位的情况下，传统的隔代抚养虽然能够满足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却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与情感表达方面关怀甚少。在这种背景下，数字媒介也会逐渐承担起“媒介补位”的角色，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和游戏等软件的使用，帮助留守儿童缓解焦虑感和孤独感，因此网络空间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也改变了农村留守儿童的交友方式，传统乡村中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同伴关系逐渐瓦解，线上的社交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交往手段。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儿童也可以在课后继续与同学交流互动，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并且网络平台也能够帮助留守儿童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来在虚拟空间中建立新的互动关系，为其扩宽交友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提供新的渠道。

然而，在强调智能手机为农村留守儿童带来的帮助以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留守儿童在抵抗网络的负面影响方面的不足。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祖辈由于文化水平与数字鸿沟，很难对儿童的手机使用进行监管，致使留守儿童极易陷入严重的手机成瘾。当线上娱乐与互动变成留守儿童消遣娱乐的主要方式时，他们的线下空间与关系势必会受到影响。并且在平台的算法推荐和兴趣选择的共同作用下，留守儿童的社交关系在得到拓展的同时也将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进而形成“社交茧房”这样的现象，从而严重阻碍其正常的社会化进程。

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选择问题，而是与家庭结构、乡村的社会环境以及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农村留守儿童使用智能手机往往伴随着许多批判的声音，但是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如果不玩手机的话，他们还能干什么？”这反映出来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在社会支持、家人陪伴以及农村娱乐设施等多方面的匮乏，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选择把头埋在手机屏幕中寻找一片快乐的天地。

所以单纯地依靠限制手机的使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协同作用，为留守儿童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娱乐环境。在家庭层面，在外务工的父母应多与孩子沟通，承担起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并教育留守儿童该如何正确地使用智能手机。也要重点关注祖辈监护人在数字环境中的能力不足问题，依托村委会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开展面向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培

训。政府和社会各组织同样需要付出努力，比如在社区里修建阅读室，篮球场等可以供留守儿童娱乐的场所，开展多样的文艺表演，组建志愿团队讲解媒介素养知识等，让留守儿童在娱乐中学习知识，拓展教育空间。除此之外，学校应根据不同主体与发展阶段实施分层教育策略，对于低年龄段儿童，应重点强化行为规范与使用习惯的培养，通过明确时间管理与使用边界，减少过度依赖；对于高年级学生，则应更加注重媒介理解能力的提升，引导其认识算法推荐机制与信息筛选逻辑，从而增强其在数字环境中的自主判断能力。同时，针对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应实施差异化引导策略，对家庭支持相对不足的儿童给予更多学校层面的关注与干预，开展心理健康课程，以及网络信息防沉迷防诈骗等相关教育，帮助学生对智能手机有正确的认识，提高其信息分辨能力。

总体而言，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理解数字媒介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留守儿童的生活世界，也能够为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新的视角。

## 参考文献

- [1] 中国统计年鉴 2023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3.
- [2] 陈大雪, 王文参. 豫东留守儿童教育现状与教育质量提升策略——基于夏邑县、宁陵县的调查研究[J]. 郑州师范教育, 2025, 14(1): 17-20.
- [3] 谷宁, 盛青云. 优势视角下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分析[J]. 乡村论丛, 2024(5): 107-114.
- [4]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9: 16.
- [5] 王清华, 郑欣. 数字代偿: 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研究[J]. 新闻界, 2022(3): 37-47, 94.
- [6] 郑欣, 高倩. 社交茧房: 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研究[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4(6): 75-86.
- [7] Xiang, B. (2010) How Far Are the Left-Behind Left Behind? A Preliminary Study in Rural China. *Population Space & Place*, **13**, 179-191.
- [8] 郑蕊, 周兴国. 留守儿童“隐忍未发”的情感体验: 危害与疏导[J]. 当代教育论坛, 2018(5): 75-82.
- [9] 任露, 毛齐明. 留守儿童家庭情感生活调查[J]. 基础教育, 2014, 11(4): 98-104.
- [10] 刘霜. 社会化视域下留守儿童社交媒体接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0.
- [11] 张苏秋. 网络媒介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3): 52-62.
- [12] 高可馨, 李沛瑶, 李真月, 等. 隔代抚养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 新西部, 2024(12): 190-193.
- [13] 鲍曼. 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M]. 谷蕾, 武媛媛,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14] Dai, Q., Yang, G., Hu, C., Wang, L., Liu, K., Guang, Y., et al. (2017) The Alienation of Affection toward Parent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 *European Psychiatry*, **39**, 114-122. <https://doi.org/10.1016/j.eurpsy.2016.07.008>
- [15] Wu, J. and Zhang, J. (2017) The Effect of Parental Absence on Chil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2**, 117-134. <https://doi.org/10.1111/aep.12166>
- [16] 赵可云, 崔晓鸾, 杨鑫, 黄雪娇, 陈奕桦. 大众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影响的实证研究[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8(3): 66-74.
- [17] Kardefelt-Winther, D. (2014)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Internet Addiction Research: Towards a Model of 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 351-354.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3.10.059>
- [18] 张国丽. 家庭支持双重缺位与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 基于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的质性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2): 366-380.
- [19] 吕薇. 补偿性媒介理论视角下媒介平台的功能建构[J].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3): 571-575.
- [20] 王清华, 郑欣. “电子益生菌”: 乡村留守儿童的手机游戏依赖及成因[J]. 传媒观察, 2023(11): 22-31.
- [21] 郑春风. 乡村儿童的手机世界——基于固厚乡的民族志考察[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20.

- [22] 张煜麟. 社交媒体时代的亲职监督与家庭凝聚[J]. 青年研究, 2015(3): 48-57+95.
- [23] 吕山, 李熠, 林颖. 远距离“做家庭”: 留守儿童家庭的媒介驯化与亲职实践[J]. 新闻与写作, 2022(11): 92-106.
- [24] 曹玥, 郑欣. 权力的流动: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媒介化及其结构变化[J]. 当代传播, 2023(4): 54-58.
- [25] 胡春阳. 寂静的喧嚣 永恒的联系: 手机传播与人际互动[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 [26] McKenna, K.Y.A. and Bargh, J.A. (2000) Plan 9 from Cyberspac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 57-7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401\\_6](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401_6)
- [27] Halberstadt, A., Crisp, V.W. and Eaton, K.L. (1999) Family Expressiveness: A Retrospective and 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In: Philippot, P. and Feldman, R.S., Eds., *Social Context of Nonverbal Behavi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9-155.
- [28] Angelini, F., Marino, C. and Gini, G. (2022) Friendship Quality in Adolescence: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Features,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E-motions. *Current Psychology*, 42, 26016-26032.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2-03564-3>
- [29] 叶剑, 贾惜夏. 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以及媒介素养探析[J]. 创业与创新, 2022, 5(6): 55-56.
- [30] 安献丽, 蒋彩敏, 陈四光, 等. 感觉寻求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关系: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 30(5): 736-743.
- [31] 朱韦明, 黄利, 周密. 手机成瘾对农村留守儿童多维健康的影响[J]. 中国流通经济, 2025, 39(5): 87-99.